

「我真的是想学一学老一辈的知识人，他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个民族，然后去摆正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关系。」



知日的風景

汪涌豪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知曰的風景

汪涌豪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日的风景/汪涌豪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309-09455-8

I. 知… II. 汪…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5265 号

知日的风景

汪涌豪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6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55-8/G · 1159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 序

当我们谈日本的时候我们谈什么

记者：各位文汇网的读者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笔会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汪涌豪教授来和我们聊聊日本。汪教授在《文汇报》上开了好几年的专栏，专栏的名字叫“东邻浮绘”，是关于日本的文化随笔。文章都非常长，给我们讲了很多不为人熟知的日本的历史典故、文化现象，以及他个人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与看法。今天非常欢迎汪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想问一下汪教授，其实现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日本的出版物，包括随笔。您觉得您的专栏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是否参考过坊间其他同类的出版物或者作品。

汪涌豪（以下简称汪）：参考过。十多年前，我在日本教书的时候，就关注过当时在日中国人的写作。他们好像分为两拨人，一拨是记者、编辑或教授，比如像李长声、段跃中、毛丹青、杨文凯、朱建荣、莫邦富、叶千荣，等等。其中有一个叫李小牧的比较特殊，他本来在中国是学舞蹈的，然后从业日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番街，就是进入了风俗圈，然后再从里面出来，写了很多东西，既新鲜又很扎实。但我觉得，这批人当中，李长声先生的写作好像更为持久，见多识广，文笔老到，我比较喜欢。另外一拨就是作家了，像萨苏、张石、林惠子，还有包括我们中文系已故教授蒋孔阳先生的女儿蒋璞。他们也写过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东西，有的还结集出版了。日本有好几种华文报纸，限于各种条件限制，在采编两方面都不能使人满意，但有这些人在那里持续地写专栏，或发表相关文章，还是丰富了外来者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也正是在这类报纸上，我还看到如董炳月、李兆忠等人在日期间写的一些文章。可惜他们中有的人回国后就不再写了。

就我个人的印象，这些人的写作各有特点，间或也有胜义可采，但整体上说，还不能贍足人心。一是许多人谈得比较表面，尽管他们有的在日本已待了十年、几十年，有的在那儿正式就职，成家立业，甚至已经入籍，不能说他们所知有限，或交游有限。为什么还会这样，我不清楚。再一个就是谈得大多无我，没有把自己放里边。一般来说，对于异文化的观察，应该既有越身事外的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超然和冷峻，同时又能让人看到，或让人在不经意中看到，其之所以作如斯观的用意和理由，但他们没有。我的感觉，许多在日的中国人太认同日本的一切了，也太希望被日本认同了。这造成了他们对日本社会、日本的历史文化，冷静审视较少。有的人，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和日本人一样，更造成他在观察时，趋同的肯定多了一些，而且是如上所说的流于表面的肯定。这也造成了第三个特点，就是谈得太过隔膜，对真正的日

本及其历史文化的了解，我认为是不够深透的。我本来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了解得也不深透，到今天为止也不能说深透，但他们的文章给了我一个刺激，就是你不能说，你去了解日本的目的，仅仅就是想融入日本，甚至泯然同化到与日本人一样，或者干脆就做成一个日本人。

其实，日本民族是很喜欢谈论自己的国民性的。所以上世纪70年代，就有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这样“撞击和刺痛”日本人心灵的著作出现。再往前推二三十年，则有岸田国是的《畸形的日本人》。并且，他们更希望别人能跳出其狭隘的局限，静观他们的长处或短处，所以对旦普曼的《孤立的大国》、基甫尼的《人是城，我是墙》、霍怀丁的《菊花与棍棒》，还有鲍格尔、威尔克逊、布莱金斯基、克里斯托弗等人的著作，怀有极大的兴趣。本尼迪克特的书就更不用说了，研究者无数。可以说，这个世界，只有日本民族最热衷于写和看“日本人论”这样的著作，这是日本人自己都承认的。所以，他们自然也很重视中国人怎么看日本，他们称这个为“中国的日本观”（当然，他们也写了大量的“日本的中国观”）。记得1943年，就有一个叫鱼返善雄的日本人，编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日本观》，里面收录了郁达夫、丰子恺、汪精卫、周作人，还有刘大杰等人的日本观察。拿这些人写的东西与我刚才举的那些人对照，差别还是蛮大的。

记者：好像还没有进步，还是有所不及。

汪：是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些老辈人物的识断。这些老辈人物虽然在日本生活得也够长久，但始终抱持着一个“闯入者”的身份，从来不想在融入的过程中失去自我。所以，他们更像“盗火者”。早先的中国人，在政治、文化和艺术各领域，都是从两个方向去盗取火种的，一个是向欧美，一个就是向日本。有时是有钱的去欧美，没钱的去日本。所以，他们完全是站在异文化的立场，冷眼旁观，我要学你的长处，克服你的短处。所以第一批

去了解日本,投入日本的人,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也好,中国的学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思,这和上世纪80年代初那些想方设法要在日本待下来,然后与日本人完全融合,成为一个言语举止、外在包装上都逼近日本人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让我想起以前汪公纪说过的话。汪公纪写过一本《日本史话》,这个人上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50年代做过东吴大学和文化大学的教授,他在该书序言里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当今国人,有亲日的,仇日的,恐日的,却唯独缺少知日的。”我的感觉,直到今天,“知日的”中国人还是很少。日本人很乐见中国有“知日派”出现,也很重视培养他们的“知华派”。反观我们,持续发展了那么长时间,我感到,中国人这么一拨拨地到日本去,有的回来了,有的没回来,但写出来的东西始终是“日本的天气很好”,“空气清新,厕所干净”,写来写去就像打了张票,然后旅游回来后写的东西一样,觉得特别不满足。譬如,都说日本人很有礼貌,我承认,也喜欢。但也有大量的例子说明日本人不但没礼貌,有时还很粗鲁呀。那么,日本人到底是粗鲁的,还是礼貌的?这里面有许多东西需要探究和厘析。所以,我是被这些想法激发着开始写这个专栏的。我觉得我在日本生活了三年,有点感受,我也可以写一些。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记者:我看您写这个专栏,挑了很多材料,现在写日本的人一般都不大涉及,有些可能连日本人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那您在挑选这些材料的时候,事先是怎么考虑的?

汪:这其实和上面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不怎么佩服前面一些作者写的东西,还有国内有些日本史研究者和日本文学研究者,他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然后在翻译与介绍上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但是,他们通常仅留意某一个单一的向度,譬如对文学史、审美史上的各家各派各说能逐一介绍,但更深广的层面,更鲜活的解说则不常看到。在深入内

里会尽人情方面，做得尤其不够。结果是，只见知识的介绍和僵硬的学理而已。可在我看来，对研究日本来说，僵硬是最不适合的攻略。因为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实在太丰富、太生动了，而且丰富生动到非常纤敏微妙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最佩服这样四个人，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佩服，上世纪30年代，人们就已经知道佩服了。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钱稻荪，当然这两个人后来都做了汉奸。他们不仅是娶了日本太太，像钱稻荪一家子，他的母亲、太太，一家子人都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对日本文化的了解非常深透。还有就是今天桌上放着的两本书的作者，一个是蒋百里，他研究《孙子兵法》，是难得的军事家，他写的《日本人》堪称名作。还有一个是戴季陶，他的《日本论》，至今还为人不断地称引。

这些人关注日本的地域，日本的环境，日本的历史，日本的阶级分层，日本的人性，然后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构架，大陆经略，全球野心，完全是站在一个异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日本，但又有“了解之同情”。其中有的人从感情上就亲爱日本，特别是周作人，他说他喜欢日本是出于两点，一个是“个人的性分”，就是因气性相投而喜欢；一个是“思古之幽情”，因为日本保留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原型。通过这些，他觉得他找到了中国人的过去。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写了许多日本的好东西，譬如日本的衣、食、住。但是像蒋百里和戴季陶就揭出了日本社会的、日本人人性中的许多问题，比较客观。不过，无论带着怎样的情感，他们都将自己观察的落脚点放在文化层面，重视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的检讨。你说日本的空气干净，人很礼貌，归结到最后，都有一个文化因素在后面。一个民族常常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东西凝聚为文化。所以，周作人在研究日本时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最高努力的表现。钱稻荪翻译《万叶集》，研究东亚乐器、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了解文化是认识一个民族、国家最

彻底、最直接也最有趣的途径。这两个人的上述结论，都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欣赏做出的。

当然，谈日本的文化大不易。有一个美国人叫穆尔，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日本文化是全世界所有伟大传统中最神秘最离奇的。更有名的当然是希腊人小泉八云了，他说：如果你在日本待了四五年，还是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日本，那就说明你开始有点了解日本了。所以，我看了刚才我举的那些人的文章，他们写的专栏，出的集子，似乎都以“知日派”的面目出现，其实按照小泉八云的标准，可能恰恰是不知日的，至少不怎么知日。你对日本沉浸下去的时间越长，了解得越深透，就越会觉得，要想用一语道断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太难。所以，我就是想以历史为依托，从文化的角度，抓住一般人不大关注的问题，或者虽有关注，但只关注到表面，没有涉及背后的问题，做一个个人化的解读。比如，我也写到过日本人的礼貌，也佩服日本人讲礼貌，但私以为引入三岛《我的狭岛祖国》和森京子的《有礼的谎言》，才能见出我对这种礼貌的完整理解。我还写过一篇关于“粹”的东西，其实写江户以来日本情色文化或歌舞伎的也有很多了，但从“粹”这个角度切入，恐怕就没人写过。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哪怕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已经很少知道九鬼周造了，更不知道九鬼和海德格尔还是师生关系，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些，或者觉得不了解这些，无碍于他们对日本的理解。但我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现实面上对人的影响，从文化入手太重要了。更何况日本是中国的邻居，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容易让人看朱成碧，所以从文化的层面入手，显得尤其重要。

现在我看报看电视，有一个年轻人叫加藤嘉一，是媒体人吧，很火的，在各地走，受多方邀请。他的一些言论我在网上看过，他的书我在书店也翻过，说实话，我把他的书名都给忘了，因为

他写的中国人非常表面，非常肤浅。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中国人认为他是“中国通”，甚至中国问题权威。我有些不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中日两方互相对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只是找了一些看得很浅的人，因为他们经常在媒体发声，我们就以为他们够专业，够权威，然后就不再用脑子区分，这种发声是聒噪呢，还是一种真知灼见。我觉得，这甚至可称是弥漫在当下许多领域的普遍现象。

其实，熟悉与研究中国的日本人有很多，人数上要超过研究美国的许多，他们分属不同的机构，有政府的，更多民间的。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以“日本贸易振兴会”规模为最大，其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中，有近两百位中国问题专家；民间规模最大的则数“亚洲政治经济学会”，1400名会员中，近一半人研究中国。年长的如高木诚一郎、国分良成就不说了。现在还出现了许多相对年轻的面孔，比如说我在日本时就知道的，像高原明生，年纪好像比我还小，这人很有名，东大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日本人都佩服他，视他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后起之秀。还有天儿慧，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的教授。他们研究中国问题就很深透，但根本不为我们所知，当然，主要是不为一般非专业的人所知。所以，导致在中日互看的时候，彼此都流于表面，这也是我之所以开设这个专栏的一个原因。我并不是把它作为美文来写的，有人说，你这些文章写得蛮好看，或者蛮漂亮，其实不是的。我没有刻意去雕琢文字。我真的是想学一学老一辈的知识人，他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个民族，然后去摆正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关系。我也有这样的意思。

记者：您刚才说的加藤嘉一，包括现在出现的那些浮浅的对看，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一些学者对日本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深透，但他面对的言说对象可能并不是普通民众。而另一方面，像加藤嘉一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

们可能第一需要的就是这些常识性的了解。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或者说比较大的问题可能是，老是停留在常识性的了解上了，没有深入下去。

汪：是的。所以我想我的专栏如果说有什么特点，就是较之那些前辈，我虽没有他们的深刻，但有当下，因为他们没有活到今天，没有可能对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回应。而对于那些时辈，现在正频繁发声的时辈，我虽没有他们生动，因为他们正生活在日本，但比他们周详。我始终把对一个国家文化的了解，视为认识这个国家的根本。

记者：记得周作人也说过，他1925年就说过这个话，从中国的位置而言，对于了解日本是有特别的必要的。刚才您也说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很近，但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彼此都看不清楚。那么，在这个文化上面，您觉得我们现在的看不清楚，除了表现在作品上、出版物上的肤浅表面外，我们现在为什么认知日本那么多年，还是存在着这样的困惑和蔽障呢？

汪：这个题目很大，如果稍稍把它改换一下，我们来看每个人被日本吸引，他的理由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他喜欢日本的动漫也好，日本的小说、电影也好，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他可能对日本的“暴力美学”很感兴趣，这是这个民族所独有的。还有比如说他对日本人所展示出的“禁忌之爱”，乱伦或不伦的露骨描写很感兴趣。许多年前，一些人确实是因此而对日本发生兴趣的。还比如，有的人是对一种“耽美情绪”感兴趣，就是完全迷恋在很细微精致的纯爱和美当中。总之，有各种原因。当然，也包括有些人就是喜欢日本的电子产品，有些人就是喜欢日本的化妆品、服装，这些在女性当中很多的。所以种种的原因，让人走向日本的文化。注意，我后面还会说到，如果只是兴趣，特别是一知半解的兴趣，很容易产生迷恋和盲从，这是导致上述认识蔽障的重要原因。

至于我个人走向日本文化的原因，其实是基于很早时候看的一部电影，松本清张的《砂器》，野村芳太郎导演的。这部电影是我所有电影中重复看得最多的，已经记不清楚是一二十遍了，而且每次看的时候都很感动，心里面有一种很深沉的东西被唤起。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日本遍路巡礼的文章，电影中那对父子的流浪，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认为是在行遍路，希望通过遍路来超脱罪孽，因为当时日本人认为，患麻风病的人是有罪的，既给别人带来麻烦，也给自己带来麻烦。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很深。其间种种复杂的人性，以及这种人性的种种变态，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解释，一直困扰着我，也非常吸引我。

后来到了日本，认识了一些日本老人。这些老人都退了休，收入很好，衣食无忧，对中国的文化一直抱有亲近感，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他们跟着我读书，每两星期一次。我在和这些老人的交往中，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会问他们。当然，我的学生也会回答我许多问题，但他们的答案通常是就事论事的，而我问到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讲得很周远，这个事情呢以前是这样的，后来就变化到这样了；至于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连我们都不懂了，诸如此类。所以他们始终给我一个追索性思考的可能。我的个性，喜欢和老人打交道，因为他们积古，他们积累了许多古旧的知识甚至习惯，在我看来，和这样的老人交往很有兴味，所以也就渐渐养成了与之相类似的趣味。

我自己的感觉，日本有三个东西我特别喜欢，一个就是它的细腻耽美，周到礼貌。先说细腻耽美。比如说日本人爱自然，它是很精致地爱自然，纯粹是从美的角度爱自然。现在三岛由纪夫人人人都知道，他的小说《春雪》，即《丰饶之海》的开卷之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里面的女主人公叫聪子，这个女孩走过庭院的后院，看到她的侍女正在喂鸡，三岛由纪夫是这样写的，“有几根鸡毛明晃晃地随风飘落，快要接近地面了”。中国的文学也

有许多景物描写，它描写景物有时是为背景的铺排，有时是为情绪的渲染，但景物与自然怎么到达人心，这个过程，在细腻度和唯美度上，似不能与日本相比。日本人是用那种很热爱、很疼惜的角度来写自然的，所以它不是说鸡毛在飘落，也不是说地上有飘落的鸡毛，而只是捕捉鸡毛和地面将触未触的那一瞬间。经由这个瞬间，岂不很清楚地表明，它对鸡毛飘落的整个过程都非常关注，只不过，现在它只切片出其中这一个瞬间而已。这就是日本人的细腻与耽美。

再举个例子，芭蕉的俳句，“今夜三井寺，月亮来敲门”。中国的文学，写月亮的何其之多，月亮代表什么东西我们也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团圆，月亮代表离别，有人写“僧敲月下门”，但很少说“月亮来敲门”。在这句诗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表现得特别美。包括冈仓天心写的《茶之书》，他里面讲茶道。今天中国人对日本茶道已比较了解，但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喝这么一小口茶，要将碗转上半天。其实，它是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培养人的禅意，和对自然的敏感与敬畏。然后它把这个“数寄屋”也即茶屋造得越来越小，后来小到只有一叠半这么大，大概两个平米多一点。茶屋的门也很小，需要匍匐着才能进去，中国人说简直是钻狗洞嘛。从“玄关”即等待室到茶屋，当中还要走过一条小小的庭院式的通道，这也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他们称作“露地”。在走过“露地”时，你要好好欣赏林中的苔藓和地衣。总之，从等待室走到茶屋的过程，就是一个调节心情，把外部世界及一切鄙俗的事情抛开的过程。然后你才进入到一个神圣的环境里，去喝那小小的一口茶。整个过程，就是培养你能契合到自然中去，去体会那种“绝对的孤寂”。包括煮水时，它也要你认真地倾听，水的声音里有竹风松籁、惊涛拍岸的意思。为了让你能听出这个意思，它特意在铁质的水壶里放上一小块铁片，水噗嗤噗嗤快煮沸的时候，铁片就会发出嗒嗒嗒嗒的声响，这个声音，

足以让你产生联想。这样的用心，真可谓无所不至，又纤毫毕至。它告诉你，如果这自然是以百分之百的样态存在着，你就必须百分之百地体会到。如果你没有体会到，你就不是一个懂自然的人。我们今天赏风弄月，能够体会得这么细致吗？大自然有百分之百的美，我们能体会多少？甚至我们的古人，比今人要好得多，但和日本人相比，在这一方面似乎仍略输一筹。日本文化对自然有足够的敬畏，真正做到完全的合一。而且，它对自然很礼敬，所以它的礼貌是贯彻全部的。

当然，最讲究的礼貌还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我在专栏中曾谈到过吃，所谓日本的饮食文化，但格于篇幅，没有充分展开。比如，日本人动筷子都有讲究，有八种禁忌，所以叫“忌八筷”。其中有一种叫“游筷”，就是筷子在菜桌上周游，如果这样挑菜吃，就是无礼。此间有许多人，在饭桌上就是这副德行，其实，你有所选择地下筷可以，眼睛判断就行了，筷子是不必跟着不停转的。还有，筷子一定要配筷枕，当这个店比较小，比如居酒屋，或路边的台屋，没有筷枕，一定要把包筷子的纸袋打个结，充做筷枕，而绝对不能把筷子直接放在桌子上，那样也是无礼。有人觉得，如此讲究有意思吗，这很苛求的。其实，它是意在培养人的仪式感，还有一种惜物的感觉。就是美好的饮食，加以我们一批人难得聚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欢会，我们都要带着庄敬和投入的心情，去享用这顿美餐。而那些粗俗的东西，都是违反这个本意的。与此相联系，它还讲究“腹八分”，就是吃到八成饱，这不仅仅是从养身角度说的，你吃得过饱，酒足饭饱以后，血不流到脑，只流到胃，难免酒后无德，耍酒疯啊，乱说话啊，日本人这样的很多，这也是很失礼的，所以他們要定出这样的讲究。可见在礼貌一途，它是贯彻得很细的。但是，日本又有句谚语说，“出门在外，做些丑事也无妨”，所以，只要不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或者出差到海外，他们是有可能胡天海地胡乱行事的。这是日本文化中

很独特的地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你如果没有长久而深入的观察，不易发现。

第二点，就是他们对传统的维护，珍视过往，点滴关心。日本人对一切过往都很疼惜，有些东西明明已经过时，但只要它关乎过往的记忆，他们就不以为过时，相反，要千方百计把它留住；它要走了，还要千方百计把它拉回来。比如相扑，我也写到过，但没有特别发扬这层意思。按我原来的理解，其实也是许多人的理解，相扑运动是一项很不合理的运动。罗兰·巴特就曾说它是“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没有大量消耗”和“争斗的亢进”的玩意儿，因此“根本不是运动”。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它不区分等级，一个重量级选手很容易把重量不够的选手摔伤，谁说没有危险？但每每这种时候，日本人会极度兴奋，情绪高涨，因此它能让人体体会到极度的戏剧性，只不过要体会到这种乐趣，你我不是行家。还有，相扑比赛中，双方体力消耗极大，所以为增加体重，相扑手要吃很多高热量的东西，怎么能说没有消耗。由于每天吃很大的一锅，非常可怕，如此囤肥，完全不符合营养学原理，所以这些人隐退后，身体有许多毛病。一般都年寿不永，寿命不是很长的。那些横纲、大关，五十多岁去世，在日本历史上并不少见。按理说，像这样一种比赛，世界上不见流行，从我们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奥运比赛项目里也没有，去投入它干什么，发展它干什么。可是日本人投入得很厉害，看的人不得了，一年有六场，东京、大阪站的比赛，常常万人空巷，票子要一年前预定。特别是东京国技馆的比赛，吸引无数眼球。现在，这一“国技”在日本有一点颓败的迹象了，相扑手和相扑部屋不时发生作假啊，吸毒啊，甚至打架之类的丑闻，导致去年名古屋赛事的转播都被取消了，今年，干脆连全国相扑巡演也停止举行了，因为闹得太出格了。道德委员会觉得，你们有伤日本的国体，日本的文化。这个东西在国民心中地位很高，这次把它禁了，也可以从反面看出它地位很高。

还有，像演歌，音调总体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五音调，“发”和“西”这两个音是没有的，只有五个音，我不懂音乐，是从书上看来的。演歌的主题也比较单一，就是“酒”、“泪”、“雨”、“雪”、“北国”、“离别”、“女人”，几乎就是这几个，所有的歌词不断地重复这几个主题。但日本人年年唱，电视台里每周有两个台播演歌，到了周日，必定有一个台整个上午都播这类节目。年终红白合战的时候，流行音乐部分和演歌几乎是五五开的，而且最高潮的部分，总是由演歌手来承担，压轴的都是唱演歌的歌手。我问过两个日本学生，“你们喜欢这个吗？”回答是，“不喜欢，但可以说很喜欢。”其实，他们现在更喜欢的，前一阵子比如说是安室奈美惠啊，后来是宇多田光和滨崎步之类，现在滨崎步都已经老了，因为倖田未来和大家爱起来了。还有，他们有许多组合，也吸引了大量粉丝。在日期间，比较寂寞嘛，我买了许多流行音乐，然后电视里也不断有流行歌手演唱会，我觉得日本流行音乐的水平比中国要高许多。后来他们说，这方面中国内地是向香港学的，香港是向日本学的。但尽管如此，日本年轻人还是很崇拜演歌的，演歌手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收入就更不谈了。所以这个东西日本还是紧紧地保存着。我想接着我会就这个话题写一篇的。

记者：如果我们做个比附，比如我们的京剧，它也有很悠长的传统，但它现在基本上不再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基本上已经退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了。但是在日本，刚才您提到的演歌也好，相扑也好，却没有退出日常生活。

汪：所以我说它珍惜过往。还有譬如和歌和俳句，每年都有专门的比赛，有的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上世纪90年代在法国举行的俳句比赛，吸引了两万多人参加。现在的欧盟总统范龙佩就是俳句的爱好者，前年还出了个俳句的歌集。日本的几大报纸，《每日新闻》、《朝日新闻》，都有和歌的专栏，参与的民众成千上万。NHK星期天早晨有两个多小时的和歌节目，这在我们这里是不可

想象的。再如私小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看。其实，私小说是以刻画种种不正常来体现日本人所谓的正常。它所描画的人的心理大都很阴暗，所刻画的人间之爱大多是“畸恋”甚至“虐恋”，有的时候，是把人性中阴暗的一面无限地放大，血淋淋地撕开，然后进入，然后把它完全展平。虽然对人性的搜讨非常彻底，但诚如有些日本评论家指出的，也会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用通俗的话说，会教坏孩子。但是日本人对自己这个传统很是崇拜。上世纪80年代“本格小说”开始的时候，私小说有一点消沉的意思，但是现在又起来了。他们认为这是日本人了解自己最好的一个途径。所以他们什么都不忍放弃。

就是我刚才讲到过的电视节目，也同样如此，内容、栏目甚至频道都力求保留原样，很少变动。我们看此间的电视节目，常常一年一个样，甚至两个样、三个样，不仅改演播室的格局，还经常改栏目设置，给栏目换不同的名字，或者干脆取消。主持人也一直在换。我去年到日本开会，那里各家电视台，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看过的栏目至今都还在，而且时段都没有改变。那些主持人，除了个别老的退休了，也都在，只是随着岁月的迁流，白发更多了一些而已。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变就一定不好，不变就一定好。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渐上年纪的人来说，我需要人生有参照物和标识物，我有点怀旧，更喜欢它能在不变的栏目中，变化出新意。而不像我们现在，外在的东西不断在变，而内里的东西还是一样。我觉得这很浪费，浪费了很多东西，所以渐渐地，我现在就不怎么看电视了。

再有一个，我觉得日本人善于学习，自强不息，发愤图强。这一点也是我很佩服的。早先，日本人很善于学习中国。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叫王桐龄的，是晚清的秀才，他到日本后，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日本视察记》。他在《日本视察记》里说，日本人对中国人很了解，他们搞了《汉文大系》，又搞了《支那